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构建互敬、互谅与互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朱 锋

2011年很可能成为东亚区域安全的转折点。目前，2009—2010年间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及中国外交“咄咄逼人”转型而引发的区域安全动荡开始走向平静。朝鲜半岛短期内难以再现2010年“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等引发高度军事紧张的冲突性事件。其他热点问题，如台海关系、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也很可能将趋于稳定。然而，从2011年迄今已发生的中东“茉莉花革命”、日本“3·11”地震、海啸灾难及福岛核危机、朝韩两国无法重回对话等事件来看，未来十年的东亚安全仍然存在一系列重大不确定因素。展望未来十年的东亚安全，重点依然在如何形成稳定的大国防务与军事互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重建，建立领土争端磋商与对话机制，以及塑造区域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等方面。显然，日本在经历了“3·11”地震、海啸和福岛核事故三重打击之后，其未来政治与防卫政策动向将给东亚区域安全增加新的变数。然而，未来十年，不管东亚区域安全究竟何去何从，最关键的是中、美、日三国能否建立起稳定与合作性的三边关系。

一、2001—2010年的东亚安全

随着“中国崛起”因素持续发酵，东亚战略格局正在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第二次重大调整。

随着“中国崛起”因素持续发酵，东亚战略格局正在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第二次重大调整。上一次调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主要内容是东亚安全秩序从冷战时代过渡到后冷战时代。上一次调整所形成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安全秩序有以下四个要点：一是继续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得以继

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续维持，美国通过前沿驻军、承担区域安全义务以及提供核保护伞，延续以其区域战略和军事优势为支撑的“霸权稳定”；二是美国奉行对华“接触”政策，通过支持东亚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兼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价值和制度竞争；三是保持区域安全热点问题的现状，通过《日内瓦框架协定》争取实现半岛无核化，通过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威慑中国对台（湾地区）“动武”保证台海和平；四是建立多种形式的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寻求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发展。东亚区域安全出现了明显的“拼图式”发展态势。

2001—2010年间，东亚区域安全在建立“区域安全架构”（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口号的推动下，其结构性要素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东亚区域内部的经济往来紧密度与相互依存度持续攀升，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性和区域内各国经济的关联性愈发明显。首先，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与共同繁荣进一步深化。2001年中国—东盟签署建立自贸区协议，自贸区2010年1月正式建成。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0年中国自东盟进口额达154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4．8%；中国自东盟进口机电产品829.4亿美元，增长39．4%，占当年中国自东盟进口总值的53．7%；中国与东盟贸易双边额达2927.8亿美元，增长了37.5%；东盟已成为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对东盟出口额达138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1%；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为163.4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倍。[1] 其次，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带动了区域内贸易交往的扩大和东亚整体经济的走强。据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介绍，这十年来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5.3%下降至9.8%，同时中国向世界开放了10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国也完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个法律法规。有数据显示，中国“入世”十年来，出口增长了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多，人均GDP由当初的80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000多美元。十年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不到10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已近600亿美元。[2] 最后，东亚在整个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不但成为与北美、欧洲鼎足而立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区域，全球经济的重心也正在向东亚转移。不远的将来，东亚会超越北美和欧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权力场”（powerhouse）。[3]

然而，从政治、军事和战略角度看，2001—2010年间，东亚战略格局经历了调整和延续，目前已走到面临新的调整的十字路口。

首先，在“中国崛起”的综合性战略冲击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正针

1 “中国—东盟成立后一年：中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4月16日。

2 “陈德铭：中国入世十年得大于失”，载《新京报》，2011年4月15日。

3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 Hemisphere: the Irrevers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East*, London: Public Affairs, 2009.

在“中国崛起”的综合性战略冲击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正针对中国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对中国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从2003年5月开始的“轴—辐结构”的调整，到2009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所喊出的“重返亚洲”口号，从美韩军事同盟的升级，到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对同盟义务与安全合作的“新认识”，从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到日本—澳大利亚防卫合作协议，从日韩防卫合作到美印核合作协定与军事技术合作协定，从美国和越南的联合军事演习到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防卫合作，美国与其同盟及战略伙伴国家正联手重组和强化针对中国的亚太均势体系。

其次，区域内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其防卫政策和战略定位，区域安全态势正进入新的调整期。2001—2005年小泉内阁时期，日中关系因“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降至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谷底。日本的区域防卫外交愈发活跃，与印度、澳大利亚、韩国、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与防务对话不断推进。日本的区域安全角色在“国际贡献论”的推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澳大利亚在2009年3月发表了新国防白皮书，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威胁”，澳大利亚还宣布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最大军费增长和军事采购计划。韩国李明博政府经历了2010年的“天安”号和延坪岛炮击这两大事件之后，其对华政策目前也正经历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最大规模的重新评估。

再次，区域内传统安全热点问题起伏不定，而紧张态势有急有缓。台海局势由于2008年“二次政党轮替”而出现实质性的稳定趋势，但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数度搁置，朝鲜已在2006年和2009年两度进行核试验，2010年末半岛局势甚至出现了有可能重回战争状态的趋势。目前，半岛南北军事对峙未见明显缓和，而朝鲜内部也在经历“接班”进程，这给半岛局势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最后，这十年间虽然区域经济和区域安全合作不断发展，“清迈倡议”已经演化为更积极的区域储备货币机制，“东盟10+3”机制也在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东亚峰会”（EAS）逐渐成形，并出现了“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会议”这样新的安全对话平台，但区域合作对地区安全的积极性推动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点就未来十年中、日、韩合作进行了规划，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三国领导人同意，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三国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在2010年之前，三国官、产、学人士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会议还发表了《中日韩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的联合声明》以及《中日韩加强标准化合作的联合声明》。2011年下半年，首届“东盟10+8”会议将正式举行，综合讨论区域内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但总的来说，2001—2011年这10年间，已经讨论多年的东亚“区域安全架构”仍缺乏稳定和创新性，东亚安全的区域结构仍然没有摆脱“拼图式”特征。

已经讨论多年的东亚“区域安全架构”仍缺乏稳定和创新性，东亚安全的区域结构仍然没有摆脱“拼图式”特征。

二、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东亚安全的轴心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架构中，中美日三边关系实际上构成了区域安全的轴心。这一三边关系的演化模式和未来走向，决定着东亚地缘政治的战略前景。虽然从表面上来看，综合军事力量更加强大的美国和中国，应担负区域安全的主要责任，但冷战结束以来20年东亚地缘政治的演变进程表明，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不可或缺，更不可轻视。

中美关系中“日本因素”的最大战略意义，在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始终以维持和加强美日军事同盟为核心。日本的这一战略选择不仅提供了美国在东亚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和承担区域安全义务的最直接条件，更重要的是，美日军事同盟关系造就了世界上经济和科技最强的国家与世界第二经济和科技大国之间的防务合作潜力。即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5月超过了日本，但美日同盟持续稳定的现实客观上弱化了中国崛起过程中“同盟重组”常常引发集团对抗和冲突升级的历史可能性。因此对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是一个“恒数”，而不是一个“变量”。这一将持续很久的东亚地缘战略现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中国“非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中国崛起正导致既有东亚同盟体系日趋紧密而非日趋松散。除了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外，“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也在推进之中，日本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防务合作在发展，美国也在增进它在东亚区域广泛建立军事与防务伙伴关系的努力。正如美国国务卿克林顿2010年10月28日在夏威夷发表演说中所提出的，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建立“在同盟、新形成的伙伴关系与友好国家的基础之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实施的“重返亚洲”战略表明，美国和日本都不接受中国崛起之后有可能在东亚形成的美中“两强格局”，拒绝接受在中国周边区域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任何政策选择。面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美国将继续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一调整的本质，说明美国正在谋求对中国实施“和平遏制”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不是不惜代价“搞垮中国”，而是要防止中国的所谓“扩张政策”引起区域国家的不安，避免由此而产生的区域冲突，防止中国挑战和限制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存在与现实利益。

中国崛起正导致既有东亚同盟体系日趋紧密而非日趋松散。美国和日本都不接受中国崛起之后有可能在东亚形成的美中“两强格局”，拒绝接受在中国周边区域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任何政策选择。

在美日军事同盟颇为稳固的同时，中美日三边关系中，中国始终是美日安全关系的“对立面”。在中美关系出现持续紧张的状况下，中日关系必然随之紧张。从冷战后20年东亚外交的历史轨迹来看，中美冲突和中日冲突几乎同时发

生。美国的“中国认知”的消极转变几乎也同时导致日本“中国认知”的恶化。例如，1996年“克林顿—桥本宣言”的发表，表明美日同盟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政策的深深忧虑；随后日本的“周边事态法案”导致中日出现政治波动。2001年4月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后，布什政府一度强调“将采取所有的政策措施维护台海的和平”。随后上台的小泉政府因“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而让东京与北京的关系陷入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2010年再度证实了这种对华关系几乎同时发生紧张的“日美捆绑模式”。先是2010年7月中美就南中国海问题出现争议，随后中美之间围绕美航母“乔治·华盛顿”号进入黄海参加美韩军演发生论战，紧接着，中日两国便在同年9月7日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美日安全关系需要持续的稳定和相互协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需要改善中美关系，但同时必须改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长期紧张和冲突，也必然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和对立。这是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

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现有格局，构成了东亚区域稳定与安全的基础。但其内在的缺陷和紧张感依然显著。面对美日同盟的强势存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压迫感难以消除，尤其是中国军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包围”的不安全感。

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现有格局，构成了东亚区域稳定与安全的基础。但其内在的缺陷和紧张感依然显著。

首先，面对美日同盟的强势存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压迫感难以消除，尤其是中国军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包围”的不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更担心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并进而和美国一起加强对中国的“岛链封锁”。

其次，中日之间的领土争议难以平息，中美有关对台湾（地区）军售问题的冲突也难以解决。再加上中国与美日之间在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纠葛，这些因素更是会继续强化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2010年9月7日中日钓鱼岛纷争对中日关系的最大伤害，是造成了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

最后、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从理论上讲，对“中国威胁”的集体认知会在美日两国进一步上升。近期，媒体披露了中国歼—20隐形战机试飞、中国新装备094核潜艇以及试射“航母杀手”东风—21D导弹等，中国军事现代化将给三国安全关系带来何种重大影响呢？目前的现实是，东亚“安全困境”确实在进一步深化，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对称性”的军备竞争。美国希望继续保持自己在常规和战略军事力量上的绝对领先优势。但中国面对美日同盟的战略压力，不会停止缩小和美国军备差距的努力。从传统的“近海积极防御”到发展“战区拒止”能力，中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原则在过去十年中围绕着“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确实出现了明显调整和变化。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效应将持续发酵，这恐怕是未来难以改变的趋势。但关键是，中国应对美日同盟战略压迫的努力，是否

会改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中国是否也会出现1945年以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所犯的错误：一个迅速崛起的东亚大国急于通过军事扩张谋求“势力范围”和资源产地，打破其他大国竭力维持的地区秩序，并不惜采取军事冒险主义来攻击其他的大国？答案是否定的。

当前，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是后冷战时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和高速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56%，中国石油进口量占石油需求量的比重上升到将近52%。[1] 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能源和国际市场，都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市场竞争，而不是地缘政治竞争获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海外驻军，更没有海外军事基地，但中国经济实现了32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是既有全球秩序的受益者，一个正推进经济市场化变革的中国更是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引擎之一。未来除非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和金融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倒退到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时代。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通过非市场经济竞争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资源、能源和市场。今天的全球政治已经证明，强大的经济和金融竞争力，比强大的军事能力更能可靠、安全和低成本地保障一个崛起大国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崛起的权力结构背景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及自由主义思潮占据话语权的全球社会体系。美国在全球拥有58个军事同盟，而中国几乎没有军事盟友。强大的军事同盟体系，而非单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才是一个大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中，中国不管如何“强大”，都难以全面挑战这一秩序，而是需要在这一秩序中获得尊重、利益和影响力。更具可能性的未来情景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加全面地影响和改造中国，那种所谓“中国统治世界”的论调有些危言耸听。[2]

然而，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依然将是复杂和微妙的，两者之间的战略紧张难以消除。未来三边关系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当前，东亚区域已经形成了战略与安全上依靠美国、贸易和发展上依靠中国的“二元结构”。2010年，虽然中美之间龃龉不断，但美国对华出口仍较去年上升30%。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增幅远远高于它向其他经济体的出口。2008—2010年，日本对华出口年均增长16.2%。[3] 强劲的对华出口是使日本国内经济景气度好转的最重要外部因素。2009—2010年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年均增加21%。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在2010年增幅也达到30%。中国已经取代日本

1 “主要石油进口国依赖比例图”，资源网，2009年8月7日，http://www.cio360.net/Page/1797/InfoID/301133/SourceId/11227/PubDate/2009-08-07/Default.aspx。

2 Martin Ja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End of the World Order and birth of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Penguin, 2009.

3 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字，2011年3月。

和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中国对区域经济影响力上升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经济因素虽然无法等同于安全因素，但密切而又强大的经济联系对安全的积极影响和引导作用是不应被低估的。[1] 未来十年，中国在东亚经济结构中作为主导性出口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只要中国继续采取理性和克制的对外政策，继续为融入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凝聚足够的国内支持，中国的整体战略和安全环境就不会发生“质变”，中国也不需要过分担忧美日军事同盟会像之前对待苏联那样对华加大“遏制”。

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下，军事同盟的绝对性和僵化性减弱了。即便经历了2010年9月令人沮丧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主党政府还是提出了稳定日中关系的政策动议。韩国李明博政府即便是一个保守派政府，主张对朝强硬并拒绝再次按照朝鲜提议恢复韩朝会谈，但首尔一直试图实行“亲美联中”政策，让自己的对外关系在华盛顿、北京和东京之间寻求平衡。这种“二元结构”，实际上增强了中国应对美日同盟军事压力的战略信心。只要中国继续采取理性和克制的对外政策，继续为融入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凝聚足够的国内支持，中国的整体战略和安全环境就不会发生“质变”，中国也不需要过分担忧美日军事同盟会像之前对待苏联那样对华加大“遏制”。

三、“后福岛危机时代”：建立互敬、互谅和互利的中美日三边合作

2011年发生的日本“3·11”大地震，将对日本经济和东亚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截至2011年4月15日，地震造成13000余人遇难，日本整个受灾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地震损失占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3%；[2] 地震共产生3500万吨垃圾，预计清理时间超过2年；日本已向太平洋排放10323吨含有辐射性物质的福岛核电站污水，这些污水很可能在30年内扩散到整个太平洋。[3] 2011年3月，世界银行调低了对东亚经济2011年增幅的预计。2010年，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增长率是9.6%，世界银行对2011年东亚经济增长率的预计是8%。

日本“3·11”地震及灾后重建势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与受灾区茨城相邻的千叶县有三菱化学的鹿岛乙烯工厂，由于遭受电力中断而停产，该厂是日本最大的乙烯工厂，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11%。日本的化工产业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化工巨头对于关键化工原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影响着整个亚洲的合

1 Linda Lim, "Can Asia Rescue the Global Economy?" *Yale Global Online*, September 29, 2010.

2 “日本大地震已确认13591人死亡”，新华网，2011年4月15日，http://news.sina.com.cn/w/2011-04-15/195522300966.shtml。

3 “东电公司共向太平洋排泄10393吨低放射度污水”，中国新闻网，2011年4月16日，http://news.sina.com.cn/w/2011-04-15/211422301197.shtml。

成材料产业。2010年，中国从日本进口总额为1767.07亿美元，其中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产品总值达到148.2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8.4%。[1] 丸善石化与出光石化的甲乙酮产能接近20%，当两者宣布停产之后，中国大陆的涂料、台湾芯片闪存等电子材料的供应都随之紧张。作为有毒苯溶剂的替代者，甲乙酮是不可或缺的化工原料，涨价已成必然。除了经济之外，灾后日本的政治和防卫政策动向也是十分引人关注。"3·11"地震后，日本出动了24万自卫队中的10万余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最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调动。鉴于日本自卫队长期的"软弱"表现，这次地震反倒凸显了"军队"在日本国家能力建设中的必要性。[2]

在21世纪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中美日三边关系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20年的调整、磨合之后，已经开始趋于某种"战略成型"。目前，摆在三国面前的最大难题不是各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猜忌，或仅局限于安全和领土争议性议题做出政策应对。更重要的是，三国如何共同应对像"3·11"地震、海啸所引起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克服像福岛核事故这类重大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多重负面影响。三国应正视目前业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战略架构，促进三边关系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模式下保持长期稳定与互利，共同享有和赢得21世纪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建立三国之间"互敬、互谅与互利"的持续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三国应正视目前业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战略架构，促进三边关系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模式下保持长期稳定与互利，共同享有和赢得21世纪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首先，三国应准确解读任一方的政策与战略选择，避免人为扭曲，从而在相互之间产生一种"威胁性认知"。例如，中国外交在2010年是不是变得更具"攻击性"（assertive）？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外交并没有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相反，中国外交很可能正变得越来越"保守"（conservative）。[3] 中国目前正处在高度敏感的国内政治经济转型期。一方面，群体性事件、腐败及贫富差距等造成的国内压力非常明显；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对中国发展进程肆意指责，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依然稳固，但"维稳"压力不断增强。日趋"保守"的外交取向可能将使中国在争议性议题上措辞"严厉"，从而容易引发纠纷，但这并不预示着中国的国际行为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或者不确定性。2010年刘晓波受颁诺贝尔

中国外交并没有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相反，中国外交很可能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中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继续埋起头来把经济建设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适度承担大国责任。

1 "日本震后对我产业最大影响：进口"，载《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3月13日。

2 Patrick Barta, Cordon Fairclough and Chester Dawson, "Japan's Crisis Bolsters Its Militar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 2011.

3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和平奖，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无知”的生动表现。不管中国做什么，不管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有什么贡献，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中国只需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在国际事务中追求“有限度”的“有所作为”。中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继续埋起头来把经济建设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适度承担大国责任。西方想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方式来将中国塑造成所谓的“负责任大国”，将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其次，中、美、日三国需要在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不回避问题和争议，努力建立既能以诚相待、相互照顾，又能直面争议、管控冲突的务实关系。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成功访问美国，在笔者看来，此访的最大成果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洞察双边关系表层“激流”背后的时代、价值与利益因素，强调双方将致力于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两国首脑会晤中，胡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发展要“登高望远”，奥巴马总统则强调两国关系必须“同舟共济”。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是“重要、复杂而敏感”，不能奢望通过一次首脑会晤解决所有争议。但2011年1月中美首脑会晤，彰显了对彼此的尊重和善意，在这个前提下不回避争议，在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做出无原则退让。因此，观察这次会晤的收获，不在于双方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而要看彼此是否愿意和能够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具有建设性和合作性的争议处理方式。

观察这次会晤的收获，不在于双方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而要看彼此是否愿意和能够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具有建设性和合作性的争议处理方式。

中日关系的性质同样是“重要、复杂而敏感”。特别是，以枝野幸男与前原诚司为代表的民主党新一代“民主型鹰派”已经全面崛起，他们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没有政治世袭背景，厌恶并拒绝金权政治。日本政治“新生代”已逐步成为政坛中坚力量。而中国也将面临政治领导层的“换代”，中国政治的“中生代”即将全面接班。这些“中生代”的从政风格整体上看是积极的和务实的，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此外，年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大力谋求2012年竞选连任。如何让中、美、日三国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们彼此尊重，建立友谊，促进理解，这是构建互敬、互谅和互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的重大课题之一。

如何让中、美、日三国的新一代政治领袖们彼此尊重，建立友谊，促进理解，这是构建互敬、互谅和互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的重大课题之一。